

從線上到線下？臉書與大學生太陽花學運參與之研究

劉嘉薇*

摘要

太陽花學運是近來最大規模的社會運動，對社會、國家造成了影響、挑戰和衝擊，但也不失為檢視我國民主運作的良好時機。與過去政治參與不同之處在於，臉書的動員力量在這次運動中經常被談論。本研究以實證研究發現，「與學運相關的臉書使用」對大學生參與學運的影響無法抹滅，但這僅影響大學生「是否」參與學運，人際網絡和資訊驅動才會增加參與的「程度」。

關鍵字：學運、太陽花學運、臉書、網路、政治參與

壹、研究動機與目的

太陽花學運是近年來發生最大規模的社會運動和政治參與。晏山農等(2015)以一場挑戰主流媒體的運動來形容這場運動，報紙的重要性在學運中幾乎不重要，電視的影響力也驟減，取而代之的是社群媒體。

太陽花學運的群眾動員不再是過去那種以菁英為核心的集結動員，而是透過網路，尤其是社群網站的連結，集結集體的不滿進而發展為行動，從而發展那種迅速傳播、立即轉播的強大動能。但也正是由於它的集結迅速，其破壞力也超出以往社會運動的控制範圍（何明修，2015）。

太陽花學運是近來最大規模的社會運動，對社會、國家造成了影響、挑戰和衝擊，但也不失為檢視我國民主運作的良好時機。與過去政治參與不同之處在於，臉書的動員力量在這次運動中經常被談論，但如此這般強調臉書對於太陽花學運的影響，是否真切？雖然媒體對臉書在學運的影響大書特書，但卻較少有系統性大規模針對大學生的隨機抽樣，本研究的特色即在此。

* 國立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教授。E-mail: jwliu@mail.ntpu.edu.tw

收稿日：2020/01/03

同意刊登日：2020/03/14

究竟太陽花學運中的臉書參與活動能否帶動實質參與本次運動？是本研究首先欲探討的焦點（問題一）。即使臉書促進了參與，我們可能仍然不解，對「實際參加者」而言，他們參加的「程度」與那些因素有關？（問題二）「是否」參與和參與「程度」是兩個不同的面向，本研究將分別探討這兩個問題。本文「參、社群媒體與政治參與」即是為第一個問題建構理論，「肆、影響政治參與「程度」的原因」即是為第二個問題建構理論。大學生「是否」參與的因素和「參與」程度的原因為何？太陽花學運在台灣民主化進程的重要性不可言喻，本研究以隨機抽樣進行面訪，結果將對如此大規模學運的參與情況提供具有代表性的描述和解釋。

過去已有太陽花學運的研究，但陳婉琪、張恒豪與黃樹仁（2016）的研究抽樣範圍為立法院圍牆外所有靜坐區域（皆為參與者），本研究的創新性在於運用隨機樣本，以面訪方式研究大學生（包括參與和未參與者）而言，太陽花學運中臉書的動員能力，臉書使用的設計較為完整（共有六題），同時以結構與網絡、人際網絡和資訊驅動因素研究參與太陽花學運的程度。此外，我們將太陽花學運的參與分為「參與與否」和「參與程度」，將之視為兩個不同面向，也表示本研究認為臉書使用與大學生「參與與否」和「參與程度」的關聯是兩回事，不同於其他研究，這也是本文研究問題合理性與必要性之所在。

本研究選擇大學生為研究對象，是因為本次運動被媒體和參與者定位為學運，參加的主體自然是學生，尤以大學生居多，因此本研究選擇大學生為研究對象。除了樣本的特色，本研究將解釋政治參與的因素歸納並重新劃分為「結構與網絡」、「人際網絡」和「資訊驅動」，較能系統性解釋政治參與程度。

至於本文主要的名詞，包括：網路、社群媒體、臉書和新媒體，其中網路為最寬廣的概念，新媒體和社群媒體的觀念相同，但有別與網路，它們是網路的特殊形式，亦即具有分享和連結的形式，至於臉書，它只是新媒體和社群媒體的一種。由於所有文獻的「稱法」皆不同，為忠於原文獻，本文保留原文獻的「稱法」，但新增如上區分各類說法的內容。

貳、政治參與

政治參與意指公民的合法活動，這些活動或多或少直接影響政府的決策，包括選

舉時和非選舉時的行為（Verba, Nie, and Kim, 1978）。上述政治參與的範圍包括選舉和非選舉時期的政治參與，屬於比較綜合型的定義。再者，與「社會運動」直接相關的政治參與定義是：有許多個體參加、高度組織化、尋求或反對特定社會變革的體制外政治行動（趙鼎新，2007），或是一種由一群彼此團結的民眾集體發動的持續挑戰，目的在於改變現狀（Tarrow, 1994）。所謂「社會運動」或「抗議政治」，是指一群人採取非正式的互動網絡，具有共享的信念和凝聚力，以突顯衝突的集體行動和抗爭手段的運用，來推動或阻止社會產生某種改變的過程（della Porta and Diani, 2006；Rucht, 2007）。

政治參與有三個重要的面向，包括去參與或不去參與、參與的方向（支持或不支持）以及參與的強度，而參與時所選擇的類型往往代表了強度（Milbrath and Goel, 1977）。Kaase 與 Marsh（1979）更曾專注討論政治抗議（political protest），亦即以運動形式表達對政治的不滿，讓政治參與的討論不再聚焦在投票。

本研究所討論的太陽花學運為政治參與的一種，偏向政治抗議的類型，依照 Boyle 與 Schmierbach（2009）的定義，此活動為體制外活動，因為這是抗議活動。而 Conway（1985）應該認為其屬於非慣常性的活動，在其定義中，遊行抗議屬於非慣常性政治參與。而若以 Li 與 Marsh（2008）的定義而言，此活動具有正統和不正統的成分，因為該活動有些部分為法律所允許，有些則不被允許。引用以上 Boyle 與 Schmierbach（2009）、Conway（1985），以及 Li 與 March（2008）等的定義主要原因是界定本次學運偏向政治抗議，由於是政治抗議運動，社群媒體對政治抗議運動的文獻更為適用，說明如以下段落。

叁、社群媒體與政治參與

以下「社群媒體與政治參與」的文獻將為第一個研究問題「太陽花學運中的臉書參與活動能否驅動實質參與本次運動？」建構理論。近年來，網路政治參與被以「網路社會運動」稱之，意謂著線下實體社會發生的社會運動由網路所促成（Castells, 2012）。其劃分方法亦不脫離過去的劃分方法，然網路動員政治參與的方法與傳統媒介的動員方式並不相同，特別是臉書便利性和極易分享、串聯、設置活動邀請等特質，在在都突顯臉書與政治參與難以斷裂的關聯。促進政治參與的原因之一便在於政治動員，Rosenstone與Hansen（1993）將動員定義為，積極份子和團體誘發（induce）他人參與的過程。Nwoye與Okafor（2014）將政治動員（political mobilization）定義為有組織地鼓動群眾，為實現特定政治目標而進行政治行動的過程，政治動員通常由政治人物、社運領袖等政治精英領導，進行由上而下的推動過程。臉書促使大量資訊的廣泛傳佈，允許公民表達自己的觀點，建立彼此溝通的傳播形式，影響了現代的公民領域，實現公民運動的理想

(Margetts, John, Escher and Reissfelder, 2011 ; Carlisle and Patton, 2013 ; Nwoye and Okafor, 2014)。

基於上述對於動員的定義，在太陽花學運中，社群媒體扮演連結領導者與公民之間、公民彼此之間的角色，強化社會資本與社會支持。臉書將現實生活中彼此不認識的人連結在一起，增強陌生人之間的弱聯繫與人際網絡的多樣性。太陽花學運的組織網絡也是開放性的結構，因此，社群媒體扮演核心學運組織領袖與公民團體以及一般公民之間的仲介人（田畠真弓，2015）。陳婉琪、張恒豪與黃樹仁（2016）研究發現，因「現實生活人際關係」而前來的現場靜坐者較不可能成為長期駐守者，而因「網友動員」而前來的參與者，跟「自發前來的人」比起來成為長期駐守者的機率更大。訊息來源為「網路」及「社群媒體」的人，要比訊息主要依賴「傳統媒體如報紙、電視」的人成為長期駐守者的機率更大。

社群媒體如何連結至實際的行動？線上參與導致實際參與政治運動需要運用符號和科技。Bennett 與 Segerberg（2013: 37）指出，社群媒體可以連結至公民的行動，是因為社群媒體具有象徵性的包容性（symbolic inclusiveness）和科技式的開放（technological openness），包容和開放的特質可以將社群媒體中的符號連結至實際的公民行動。陳順孝（2012）也認為，社運組織不一定要經常見面開會，而可以藉由網路群組討論，同樣是基於社群媒體的包容和開放的特質，透過這些特質，同樣能納入多元意見。

社群媒體連結至太陽花學運已有一些研究，包括 Twitter 的研究、傳統媒體在學運中式微，以及人際傳播和社群媒體在動員學運參與的較量，它們大多肯定臉書在太陽花學運的正向影響。鄭宇君與陳百齡（2016）研究太陽花學運時 Twitter 的聲量，發現當運動發生直接衝突時，公民目擊及直播頻道會帶來瞬間大量的訊息擴散，公眾透過在社群媒體轉發或評論即時新聞，做為即時參與運動的另一種形式。陳婉琪、張恒豪與黃樹仁（2016）發現，因「現實生活人際關係」而前往太陽花學運現場者較不可能長期駐守；反而因為陌生網友影響者較為投入。孔令信（2016）研究太陽花學運發現，學生運用網路直播、募資平臺等數位媒體傳遞資訊和動員，產生不少商機和媒體新的經營模式，訊息在網路上匯流與分流，可以搶到速度和議題主導權。林麗雲（2016）也指出太陽花運動中臺大新聞所學生在臺大新聞「E 論壇」如何討論運動，建構知識並行動，學生除了在論壇上討論，更基於集體認同，付諸行動前往現場當記者。

再者，陳婉琪、張恒豪與黃樹仁（2016）利用在運動現場所蒐集的〈太陽花運動參與者調查〉資料，輔以2014年〈台灣社會變遷調查〉的公民權組資料來進行分析，這筆資料訪問的是所有年齡層的民眾，本研究與之不同的是，針對大學

生進行隨機抽樣面訪樣本的研究，之所以選擇大學生，如同前言所提，主要是因為大學生是社會中堅，他們的政治參與關係著民主政治的發展。陳婉琪、張恒豪與黃樹仁（2016）以全體民眾為分析樣本，已具有高度價值，本研究的突破是研究參與主體，亦即大學生，擴大大學生樣本，目的不在於推估全體民眾的參與情況，而在於突現「學運」此一學生運動的主體。

從以上對太陽花學運的研究發現，使用臉書的確驅使個人的政治參與，它降低了參與障礙。整體而言，臉書的使用的確連帶影響線下公民的政治參與，網路可幫助公民瞭解政治資訊，與其他人進行討論，達到交流的目的，促進政治參與。臉書等相關社群媒體的出現，讓網際網路的特性更加鮮明，與他人建立起朋友關係或是利用追蹤功能獲得自己有興趣的訊息，利用相關粉絲頁面瞭解各種議題，社群網站改變了傳統媒體的傳播模式，傳播訊息的成本降低，訊息傳播的速度即時，使用社群媒體往往在事件發生不久就能接收到相關訊息，使用者不僅成為快速傳播的受惠者，傳統的媒體也因應改變自己的傳播策略（Vesnic-Alujevic, 2012）。從相關的文獻，我們也能得到理論的引導，社群媒體改變了使用者的視野，例如臉書本身的功能具有獨特優勢能促進線上參與（如新聞推播與個人塗鴉牆），提供促進政治參與的工具，使個人的政治表達能傳播至網路受眾或線上公眾領域（Harlow, 2011；Carlisle and Patton, 2013）。綜上，臉書使用會影響政治參與，但畢竟臉書只是一種管道、一種媒介，是否會僅因為在臉書上的「結構與網絡」（以下詳述）因素而參與，或有其他因素的驅動？

本文將「臉書」與其他社群平台（如：PPT）與媒體（如：傳統／主流媒體）切割開來，並非認為臉書可以以一擋萬，而是如同本文文獻檢閱（周偉航，2014；今日導報，2014；陳婉琪，2014；蕭蘋，2014；于艾莉，2014；張約翰，2014），臉書在學運中有強大的功能，本研究試圖驗證這個說法，結果並非如同文獻所言，臉書僅能讓大學生參與，卻無法再度增強其參與程度。

至於本文的研究目的，倒不是在「神化」臉書在學運的功能，主要是因為當時大學生認為大眾媒體新聞頻道缺乏公信力（陳淑貞，2014），所以從主要的社群媒體臉書著手。雖然這些臉書的使用可能受限於「同溫層」效應（Boyd, 2014）甚至經常產生回聲室效果，但我們研究的便是臉書上同溫層的現象與實際參與的關聯，會去現場參與也是一種同溫層的現象。

肆、影響政治參與「程度」的原因

強化政治參與「程度」的原因是本研究第二個研究問題，以下文獻將為問題

建構理論。本研究奠基於過去政治參與的文獻，歸納出引發政治參與程度的三個面向，這三大面向為作者根據以下文獻綜整歸納，非本於單一文獻，原因是所有文獻的分類不盡相同，僅採用單一文獻的分類為分類較無理由，因此採用綜整後分類的方式進行，包括「結構與網絡」、「人際網絡」以及「資訊驅動」三大因素，分述如下。這三大因素為何適用於本研究，乃是因為這三大因素幾乎涵蓋了影響政治參與「程度」的重要因素。不過因為這些文獻中並無直接探討影響「大學生」政治參與的文獻，因此以下檢閱的是「一般」影響政治參與的因素，並於探討三大因素後，補充可能影響大學生政治參與的因素。

這些影響「政治參與」「程度」的原因，即是「臉書參與」「程度」的原因，因為臉書參與是政治參與的一環，因為專談臉書參與的文獻並不完整，或說是正在發展中，本研究以影響政治參與「程度」的原因為架構進行討論，較為完整。其中本研究主要著眼點：線上參與導致實際參與政治運動，也包括其中，主要在（一）結構與網絡的討論中，至於（二）人際網絡和（三）資訊驅動則為影響線下實體政治參與的因素，一併納入討論，並最為後續統計分析時的控制變數。

本研究連結「結構與網絡」、「人際網絡」和「資訊驅動」的理論架構為影響動員的三大因素，包括「結構與網絡」（圖一稱之為「臉書使用」，圖二為與另兩因素名稱「人際網絡」和「資訊驅動」並列，改稱「結構與網絡」，其實就是模型一的「臉書使用」）此一網路媒介因素、「人際網絡」此一人際因素，最後還包括「資訊驅動」此一理性因素，前兩者是媒介因素的兩大面向，包括網路面向和人際面向，亦即前往太陽花學運是否包括虛擬的網路動員以及實體的人際動員，前兩者都是「被動員」參加的情況，至於大學生是否受到資訊驅動等理性因素而參加，資訊驅動是使用動機的一種，它是較理性的動機，至於「結構與網絡」和「人際網絡」則偏向被動員。三者綜合起來，包括了被動員和理性的面向，對於解釋大學生對學運的參與有一較完整的圖像。

一、結構與網絡

結構與網絡意指社群媒體具有連結不同的組織或團體政治參與的功能，亦即線上參與導致實際參與政治運動。臉書提高了社會資本與網路社群的發展，讓人們可以與組織相互互動，開始對話（Carlisle and Patton, 2013）。集體行動的產生源自於個人受到社群媒體的影響，透過社會網絡的號召將有助於人們參與社會運動。在臺灣，因為臉書是太陽花學運期間使用最多的社群媒體（陳婉琪，2014），

因而研究之。關於臉書使用的測量，大多採用「瀏覽」、「按讚」、「發表」、「分享」、「加入粉絲團」、「更改大頭貼」以及「接受活動邀請」(Losifidis and Wheeler, 2017；Miller, Bobkowski, Maliniak and Rapoport, 2015)

同時社群媒體能激發群眾的情感動員，促使當權者必須回應抗議者的需求 (Breuer, Landman and Farquhar, 2012)。Obar, Zube, and Lampe (2012) 認為社群網路可以促進公民參與與集體行動，社群媒體可以完成宣傳活動與組織特定活動目標，臉書被認為是最好的（因此以下的討論著重於臉書），而 YouTube 則是最差的，Twitter 和部落格次之。社群媒體不只能強化宣傳效果，更能形成組織團結意識。且社群媒體的雙向溝通功能，使其能與準成員進行雙向對話，並能創造及維持組織的團結意識，促進組織發展。

再者，Breuer, Landman 和 Farquhar (2012) 和 Weber (2013) 檢驗菁英如何使用社群媒體散布資訊，形成社會網絡，動員抗議者，發現社群媒體之所以能促進社會動員，乃在於其分散化的數位結構，也就是說，社群媒體能夠分別與單獨的個體進行協調與溝通，並且將資訊擴散給其他人，透過個人的網絡將資訊進一步傳遞下去。

二、人際網絡

人際網絡意指在政治參與中的人際關係，人際關係是人際傳播的基礎和根本。個人的政治參與取決於與社會團體間成員與非團體成員的連結度，個人與整個社會的連結程度愈高，就愈可能參與社會運動 (Snow, della Porta, Klandermans, and McAdam, 2013)。而政治參與過程中人際傳播造成的資訊流動能夠拓展人們的觸及範圍，使得訊息即時傳送，將人們串聯在一起 (Nwoye and Okafor, 2014)，當親近的人邀請參與某項政治參與活動，此時同意參與的機率更高 (Shah, Kwak, and Holbert, 2001；Carlisle and Patton, 2013)。

此外，學校老師對於學生政治參與亦扮演鼓舞和催化的角色 (Campante and Chor, 2012；Ekman, 2013)。現實世界人際網絡的拉攏，可以促使人們的政治疏離轉換成積極政治參與 (Shah, Kwak, and Holbert, 2001；Carlisle and Patton, 2013)。最後，父母對子女政治行為的影響也得到過去文獻的重視 (Beck and Jennings, 1991；Niemi and Jennings, 1991；Stoker and Jennings, 1995)。整體而言，人際動員強調的是因為人際原因而參與學運，例如包括被動行為「因為老師將課程帶到

學運現場上課」和其他主動行為，包括因為同儕、老師和父母鼓勵。

三、資訊驅動

資訊驅動意指人民因為訊息的因素而進行政治參與，這類原因通常是對議題有知識上的認知而參加，非情感因素。其重要的特徵是，民眾要認為這個活動的目標與策略是值得參與的（Snow, della Porta, Klandermans, and McAdam, 2013）。資訊可用以理性估算自己的風險得失，相關事件的資訊可作為未來事件的借鑑，因此得以促使新的社會運動產生（Breuer, Landman and Farquhar, 2012）。

議題討論會催化群眾將相關信息進行分享，對相關議題進行審議，並進行動員，而此舉將有助於組織進行抗議性的參與。資訊的社會連結能力提高了集體行動的高參與度，促使集體行動的號召能迅速擴展並發酵（Mercea, 2013）。Bonifácio 與 Paulino（2015）便發現，當民眾對執政者的貪腐不滿到一定的程度，便走上街頭政治參與，這也是一種理性思辨力的展現。資訊的討論是政治參與的主要骨幹，透過討論可以創造動員的資訊、思考有關的新聞和公共議題，以及達成共識，這些都是參與的前提條件。當人們開始討論公共事務，他們更容易參與在政治活動當中（Valenzuela, Kim, and Zúñiga, 2012）。總結來說，資訊驅動因素是因議題本身或施政表現等理性因素而參與，非人際拉攏或情感上不滿而參加。上述社群媒體或政治參與因素的文獻，多著墨在一般民眾的研究，鮮少著重在大學生的研究，研究一般民眾是過去文獻的趨勢，本研究一方面採用過去研究一般民眾的文獻，也開發其他研究對象（大學生）。

除了以上三大因素，在個人背景因素方面，同一世代由於類似的生活經驗，因此對政治參與「程度」也有類似的看法（Jennings, 1987）。至於什麼因素會造成政治參與「程度」的分殊，教育程度和政治知識是政治參與「程度」的影響因素（Snow, della Porta, Klandermans, and McAdam, 2013）。此外，政治興趣對於個人在網路上的參與行為也具有重要的影響性，即抱持較高政治興趣的人在臉書上的政治參與行為就愈積極主動（Carlisle and Patton, 2013）。但傳統上認為父母收入、性別與種族的影響並不會出現在臉書中，因為臉書創造了公平的競爭環境，使在傳統環境缺乏資源者在網路上有了能力（Carlisle and Patton, 2013；Oser, Hooghe, and Marien, 2013；Espinal and Zhao, 2015）。另一說是，網路使用的確會提高政治參與，但此種增長卻不成比例地發生在社經地位高低不同、政治感興趣高低不同的人身上，亦即網路使用增加了社經地位高以及對政治具有高度興趣的人的政治參與「程度」，進而不斷地複製或擴大網路未普及前政治參與的鴻溝

(Schlozman, Verba, and Brady, 2010)。

政治興趣一直以來是引起政治參與的重要原因，臉書使用究竟動員了政治興趣高的人，或是動員了政治興趣低的人，然因過去的研究發現為折衷論(Yang and Bergrud, 2008)，亦即臉書動員了部分的民眾參與政治，因為這些研究尚無定論，本研究未將臉書使用與政治興趣進行交互作用，進一步作為自變數。

大學生的社經地位和教育程度雖幾乎相同，但以上提及的變數包括：性別、種族（在我國相近的變數為省籍）社經地位、政治知識、政治興趣、學校屬性以及學系屬性等，將可分析之。大學生個人社經地位幾乎無變異，但可以「家庭」社經地位取代，便能看出差異，至於專屬影響大學生政治參與「程度」的因素，除了學校屬性以及學系屬性，「修習政治相關課程學分數」亦是可納入的變數。

此外，因為服貿議題涉及中國大陸因素，因此與政治意識型態息息相關的政黨認同、統獨立場和族群意識也將納入作為控制變數。再者，政治功效意識(Creighton, 2005；Karp and Banducci, 2008)為影響政治參與「程度」的重要面向，同樣列入控制。

綜上，本研究將分析可能影響大學生參與太陽花學運的原因有那些？從社群媒體的角度而言，臉書是否影響學運參與？以及那些因素影響參與「程度」？尤其「結構與網絡」、「人際網絡」和「資訊驅動」對大學生學運參與「程度」孰輕孰重？更是我們未知的世界。

伍、研究設計

本文研究設計內容包括研究架構、變數操作化，以及資料來源，說明如下：

一、研究架構

本文研究設計如圖 1 研究架構圖 1，包括大學生「與學運相關的臉書使用」（以下分析時簡稱：「臉書使用」，不再特別指出是太陽花學運的臉書使用）與「是否」參與太陽花學運有關，根據文獻檢閱，我們認為臉書使用與太陽花學運的參與有關。與學運相關的臉書使用與實際參與當然不會完全相同，但與學運相關的臉書使用與實際參與是否有正向關聯呢？它與「參與與否」是否有關，即使會，它與「參與程度」有關嗎？

本研究設定的臉書使用是指「與學運相關的臉書使用」，若非如此設計，就無法確知大學生使用的內容是否與太陽花學運相關，因此本研究將臉書使用設定在「與學運相關的臉書使用」，以便與線下實體的太陽花學運參與連結。

二、變數操作化

一群會透過臉書搜尋或參與學運討論的特定人士不一定意謂著會前往現場？我們要問的是在臉書上對太陽花學運的各種行為是否促成大學生到現場參與？需要強調的是，這裡的臉書使用不是泛指一般或平時臉書的使用，而是學運期間在臉書上對學運相關訊息的各種接觸，稱之為「與學運相關的臉書使用」。臉書使用是媒體使用層面，學運參與是政治參與層面，前後分屬不同層面，但前後測量的「標的」需相關，亦即前者測量的是關於「太陽花學運」的臉書使用，後者測量的是是否參與「太陽花學運」和參與程度。

至於「參與的大學生」，又與那些因素有關？以圖 2 研究架構圖 2 表示，討論文獻所指引發政治參與的三個面向，探討臉書此一「結構與網絡」（線上參與導致實際參與政治運動）因素是否與參與的程度有關，或是另有「人際網絡」或「資訊驅動」因素？本研究所提的資訊驅動，內涵包括因知識、議題、施政表現等理性因素。臉書使用不包括因知識、議題、施政表現等理性因素，純然是臉書的使用行為，包括：「瀏覽」、「按讚」、「發表」、「分享」、「加入粉絲團」、「更改大頭貼」以及「接受活動邀請」等。在兩個研究架構圖中，控制變數皆包括性別、省籍、家庭社經地位、修習政治相關課程學分數、政黨認同、統獨立場、族群意識、政治功效意識、學校屬性以及學系屬性。

這些控制變數因為僅作為「控制」變項，且多為人口背景變數（性別、省籍和家庭社經地位），因此其與依變數的關聯不在「主要」討論之列，在此亦不贅述。但針對非屬人口背景變數，卻納入控制變數的變數，以下說明之。包括政黨認同、統獨立場和族群意識，在我們的政治脈絡中，因為屬重要政治態度，因此納入控制。政治功效意識對政治參與的影響則已是討論政治參與不可或缺的變數（王靖興、王德育，2007；劉嘉薇，2014；Creighton, 2005；Karp and Banducci, 2008）。「學校屬性」、「學系屬性」、「修習政治相關課程學分數」屬於大學生（非一般民眾）特有的變數，需要納入控制。

因大多數文獻論證臉書使用會強化實際的政治參與，因此本研究也採用兩者正相關的假設，包括即將以模型一處理的「與學運相關的臉書使用愈多，大學生

會去參與（相對於不會去）」以及以模型二處理的「因為結構與網絡因素參與學運者，參與程度愈高」、「因為人際網絡因素參與學運者，參與程度愈高」，以及「因為資訊驅動因素參與學運者，參與程度愈高」。至於本研究提出的三大參與原因，應與參與太陽花學運有正向關聯，至於何者關聯較大，則有待本研究後續進一步釐清。

本研究之所以將依變數區分為「參與與否」和「參加程度」，是因為在「參與程度」的架構中才需要納入參與原因，包括本研究所界定的：結構與網絡、人際網絡和資訊驅動。至於「參與與否」的架構中，因為有一類為「未參與」，因此無法以「參與原因」解釋之，所以兩個架構的自變數不同，亦即需要拆成兩個架構討論。這也是為什麼「結構與網絡」、「人際網絡」、「資訊驅動」這三者只被用來預測參與程度，而非「參與與否」的原因。我們首先在研究架構圖一討論臉書使用與「是否」參與學運是否有關，圖 2 是進一步分析，若是去參與，參與程度與那些因素有關。「與學運相關的臉書使用」是否被當作重要解釋變數放入第二個程度模型中？其實已置入，而是模型二中「結構與網絡」因素即是模型一中的「與學運相關的臉書使用」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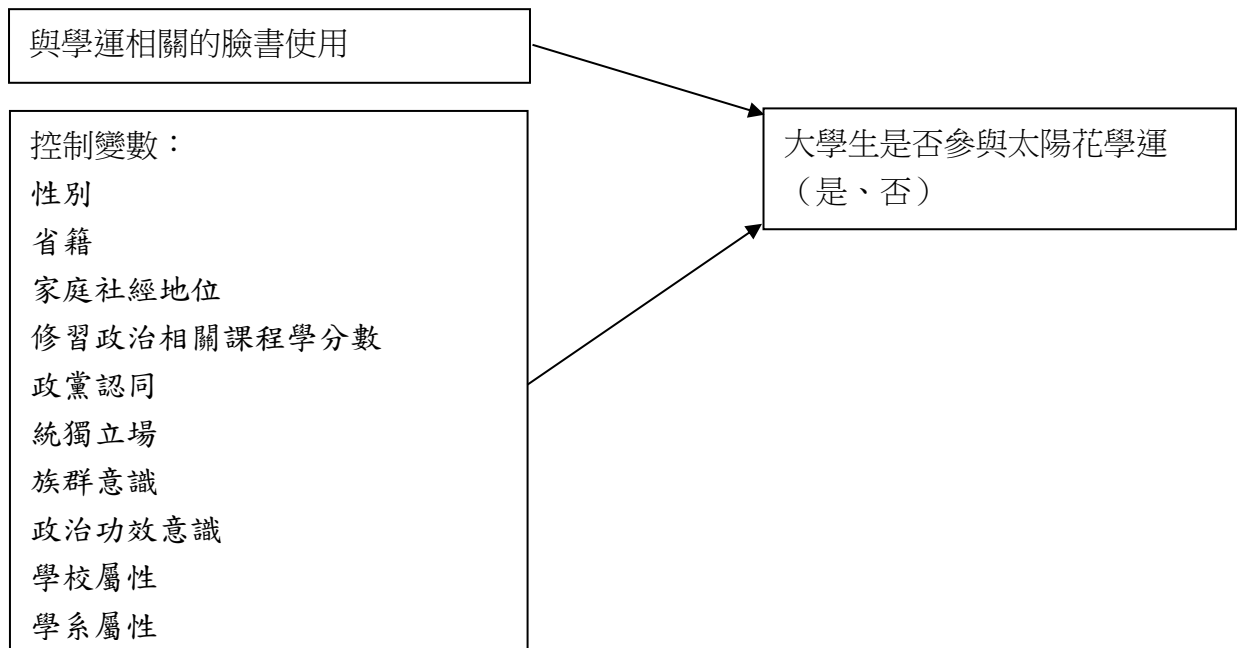


圖1：研究架構圖1（所有大學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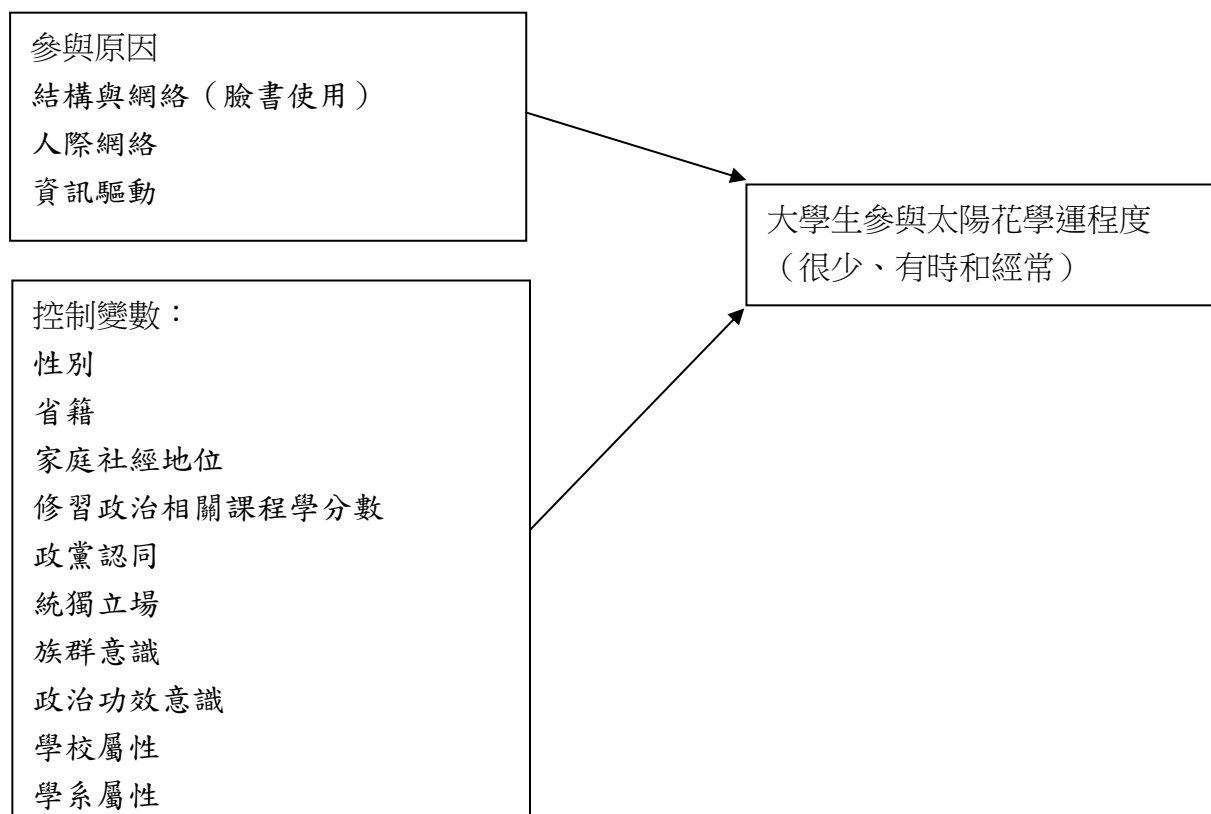


圖2：研究架構圖2（僅含參加學運的大學生）

三、資料來源

本研究運用大學生調查研究資料回答此一問題，本筆資料也是唯一一筆在學運後以隨機抽樣完成的大學生面訪研究。作者在 2014 年學運爆發「後」，便設計太陽花學運網路動員的問卷題目。本問卷透過面訪方式完成 1,094 份問卷，參與本次學運者主要為大學生，因此本研究亦將研究對象界定為大學生。

至於本研究為何仍界定為大學生，主要是因為本次運動被媒體和活動參與者界定為「學運」，亦即主要參與者仍是學生。再者，在學運過後研究學運，比較可能的方式會是進入校園進行大學生面訪，對於學運參與者的掌握會比較好，且能瞭解那些背景的大學生沒有參加學運？

本研究所進行訪問的對象，以臺灣地區的大四學生為母體。依照教育部統計處（2015）的資料，我國大學（四年制、不含軍警學校）約 148 所，大四學生自然無法代表所有大學生，基於以下原因，本研究選擇了大四學生作為研究對象：選擇大四學生的原因在於他們已經過大學前三年教育，接受更多大學教育的洗禮，

大學環境對於大四學生有更長時間的洗禮。另外一個原因是，本研究在這些大四學生大一時，即被本研究開始追蹤研究，因此本研究才能在學運後，有效率地找到這些大四學生。再者，比起已經踏入社會的青年，他們對政治的想法有較多被影響、被社會化的機會，加上大學生的政治參與關係著民主政治的發展，我們將以此為研究對象。綜上，大學生之所以為本文研究對象是因為他們是學運的主體，即將邁入社會的大四生，更是引領社會前進的社會新血，他們的意見更形重要。

我們以各校為分層單位，將全臺大四學生依照公、私立大學一般大學與公、私技職院校以及師範大學等標準分為五個層別，接著以各校為第一抽出單位（Primary Sampling Unit, PSU）。然後再依據樣本大小與抽出單位機率等比例的原則（Proportional Probabilities to the Size, PPS），讓各校的大四學生有相同的中選機會。訪問抽樣設計以及各層的成功樣本數參考表 1，本研究訪員為本研究到各公私立大學招募的大學生，我們在這群學生在大一時，完成了 1,754 份大一樣本，他們大四時適逢發生太陽花學運，便從這 1,754 份樣本中追蹤完成 1,094 份樣本，歷時已三年，成功率仍達 62.4%（1094/1754）。

表 1：本研究抽樣架構

抽樣分層	人數	百分比	抽取學校數	各校抽取系數	實際完成樣本數
公立一般	33,663	16.1%	5	4	214
私立一般	69,560	33.2%	6	7	358
公立技職	18,489	8.8%	4	3	84
私立技職	80,433	38.3%	8	6	403
師範	7,558	3.6%	2	3	36
合計	209,703	100.0%	25		1,094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本研究執行過程從整理過去問卷和樣本開始，由於本次為追蹤訪問，故未施行前測與抽樣。問卷確定後，即印製問卷和訪問相關物品、購買禮物、招募督導與訪員，並且在訪問前夕先後舉行督導訓練和訪員甄選說明會，說明訪問執行注意事項與標準化訪問流程。訪問由 2015 年三月下旬開始¹，執行訪問與複查工作最後於七月初結束，問卷編碼從七月中旬開始至八月中旬，完成後於八月下旬開

¹作者在 2014 年學運爆發「後」，便設計太陽花學運網路動員的問卷題目，訪問由 2015 年三月下旬才開始的原因是因為這個大學生面訪定位為每學期結束進行一次，會詢問當學年發生的政治事件，非一般民意調查的即時研究，而是經過一段政治社會化的過程才詢問受訪者，更能體現事件的長期影響是否存在。

始進行資料輸入，輸入完成後於九月上旬開始進行資料檢誤，為使樣本資料符合母體比例，本研究已使用性別和學校屬性層別加權資料，樣本具有代表性。

其中依變數為「參與太陽花學運的程度」，「程度」代表的是頻率，本文的測量為「很少」、「有時」和「經常」²。所謂的「參與」在本文指的是現場參與，不含線上的參與。之所以沒有把線上參與列為本研究的依變數，是因為本研究欲解釋的是線上的參與會不會促成線下實體參與，因此無法將線上參與列為依變數。參與程度依序為「從不」、「很少」、「有時」和「經常」。而自變數「與學運相關的臉書使用」的設計如附錄，包括瀏覽、按讚、發表、分享、更改大頭貼、加入粉絲團以及對活動邀請按參加。再者，針對研究架構圖二，關於各種參與的原因，包括「結構與網絡」、「人際網絡」和「資訊驅動」。本題為複選題，分析時將每一選項視為一題，「結構與網絡」、「人際網絡」以及「資訊驅動」的概念和問卷題目整理如附錄，各指標處理情況、最大值和最小值說明如附錄。

本文提及臉書使用者可以隨時自由創造內容，然並非所有臉書使用者都會真正「創造內容」，不過這些使用者卻是「瀏覽」了、「按讚」或「分享」了或這些他者創造的內容，因此我們在附錄「與學運相關的臉書使用」的變數中，以六種臉書使用形式區別了使用程度。

關於三大自變數的概念操作化，「結構與網絡」指的是具有連結不同的組織或團體政治參與的功能，亦即線上參與導致實際參與政治運動，因此我們將「因為臉書上對學運的使用」界定為「結構與網絡」。再者，人際網絡意指在政治參與中的人際關係，人際關係是人際傳播的基礎和根本。對大四學生而言，「因為同儕邀請」、「因為老師鼓勵」、「因為老師將課程帶到學運現場上課」以及「因為父母鼓勵」都屬於因為人際傳播而參與學運的面向。

最後，資訊驅動意指人民因為訊息的因素而進行政治參與，這類原因通常是對議題有知識上的認知而參加，非情感因素，包括知識、議題和施政表現等理性因素。在本研究的界定中，「因為想增加對於學運的瞭解」屬於知識層面，「反對經貿自由化」、「反對與中國大陸有更緊密的經貿交流」和「反對黑箱程序」屬於議題層面，「反對馬英九總統領導的政府」和「不滿政府處理學運的方法」屬於對施政表現的評價。其中「反對與中國大陸有更緊密的經貿交流」的設計也呼應了本文前述所提瞿宛文（2015）和蔡佳泓與陳陸輝（2015）的研究。

²「很少」參加比起「有時」參加更少，至於為何不直接問參與次數，是因為參與次數如果較多時，可能容易忘記或記不清楚次數，可能會造成測量效度的問題。

陸、研究發現

以下研究發現分為太陽花學運「參與情況」分析、太陽花學運「參與與否」分析，以及太陽花學運「參與程度」分析，分述如下：

一、太陽花學運「參與情況」分析

首先，太陽花學運的參與情況如何？在 1,092 個樣本中，「從不」參加者佔 70.7%，「很少」參加者佔 12.7%，「有時」參加者同樣佔 12.7%，「時常」參加者僅佔 3.9%。整體而言，從未參加者佔七成，曾經參加學運的大四學生佔三成，這三成將是本文分析的焦點。見表 2。

表 2：太陽花學運參與程度

	N	%
從不	772	70.7
很少	138	12.7
有時	138	12.7
時常	43	3.9
總計	1,092	100.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太陽花學運「參與與否」分析

至於那些因素與大四學生「是否」參與太陽花學運有關，將「很少」、「有時」和「時常」編碼為 1，代表「是」，把「從不」編碼為 0，代表「否」。為了解釋是否參與，因為依變數是二分變項，因此採用 binary logit 模型。在自變數方面，依架構主要為「臉書使用」，其次為控制變數。自變數和依變數編碼，請參閱附錄。作者將多個變數合併的理由是基於理論的意義，為了對應到整理出的三類參與原因，合併後指的新變數，指涉的概念是指這些概念的意義，且一個概念需要有多題合併較能體現概念，若只有一題，可能失之偏頗。

究竟太陽花學運中的臉書參與活動能否帶動實質參與本次運動？是本研究首先欲探討的焦點（問題一）。在「參與與否」的模型中（表 3），「臉書使用」會與大四學生「是否」參與太陽花學運有關嗎？答案是會的。當「臉書使用」增加一單位，「參與」太陽花學運的機率是「不參加」的 1.396 倍（ $B=0.33$ ， $p<.001$ ）。

至於在控制變數方面，性別、家庭社經地位、學校屬性和學系屬性與大四學生參與太陽花學運有關。男性比女性更會去參與學運，男性「參與」學運相對於「不參與」的機率是女性的 1.506 倍 ($B=0.41$, $p<.05$)。家庭社經地位「高」和「中」的大四學生比起家庭社經地位「低」的大四學生更會去參與學運，高者「參與」學運相對於「不參與」的機率是低者的 1.878 倍 ($B=0.63$, $p<.05$)，中者「參與」學運相對於「不參與」的機率是低者的 1.588 倍 ($B=0.46$, $p<.05$)。

就讀「公立技職」大學的大四學生，比起就讀「私立技職」學校的大四學生，參與太陽花學運程度愈低 ($B=-1.10$, $p<.05$)；就讀「非法律」科系的大四學生，比起就讀「法律」的大四學生，參與太陽花學運程度愈低，所有 B 系數都是負向。本研究認為就讀科系代表了一種政治社會化的過程，法律系相較於其他科系，體現了更多追求社會正義的價值。

至於控制變數中的其他因素與學運參與程度都無顯著相關，包括：省籍、修習政治相關課程學分數、政黨認同、統獨立場以及族群意識，說明了臉書使用是大四學生參與學運的重要原因，學系屬性也相當重要。

表 3：太陽花學運「參與與否」binary logit（所有大四學生）

	模型一：參與程度		
	B	SE	odds
臉書使用（6-24）	.33***	.026	1.396
男性（對照：女性）	.41*	.200	1.506
省籍（對照：本省閩南人）			
本省客家人	-.22	.276	.803
大陸各省市人	.13	.320	1.137
家庭社經地位（對照：低）			
高	.63*	.302	1.878
中	.46*	.225	1.588
修習政治相關課程學分數（0-36）	.04	.032	1.044
政黨認同（對照：泛藍）			
泛綠	.15	.264	1.164
中立	.14	.241	1.144
統獨立場（對照：統一）			
獨立	-.29	.364	.746
維持現狀	-.54	.362	.585
族群意識（對照：中國人）			
臺灣人	.14	1.031	1.151
都是	.19	1.056	1.205
政治功效意識（3-12）	-.04	.051	.958
學校屬性（對照：私立技職）			
公立一般	.33	.254	1.388
私立一般	.20	.235	1.220
公立技職	-1.10*	.438	.334
師範	-.21	.504	.812
學系屬性（對照：法律）			
教育	-3.65**	1.113	.026
人文藝術	-3.77***	.978	.023
經社心理	-2.52*	.985	.080
商學管理	-3.41***	.972	.033
理科	-3.45**	.992	.032
醫科	-4.62***	1.060	.010
工科	-3.44***	.986	.032
農科	-5.03***	1.258	.007
常數	-2.13	1.48	0.12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說明一：依變數 1 為「有」，對照組 0 為「無」。

說明二：樣本數=985；Cox & Snell $R^2=.318$ ； $df=26$ ； $\chi^2=377.618$ ； $p<.001$ 。

說明三： $p<.001$, **: $p<.01$, *: $p<.05$

三、太陽花學運「參與程度」分析

至於在上述有參與太陽花學運的大四學生中（包括很少、有時和時常），參與分數編碼愈高，參與程度愈高。即使臉書促進了線下參與，我們可能仍然不解，對「實際參加者」而言，什麼原因與他們參加的「程度」有關？（問題二）。為了解釋參與原因，因為依變數是順序尺度，因此採用 **ordered logit** 模型。在自變數方面，依架構包括「結構與網絡」、「人際網絡」以及「資訊驅動」，其次為控制變數。自變數和依變數編碼，請參閱附錄。

在「參與程度」的模型中（表 4），什麼樣的「原因」會增加或減少對太陽花學運的參與程度？當大四學生參與的原因是「結構與網絡」（亦即臉書使用），不會增加對太陽花學運的參與程度（ $p>.05$ ）。然而，因為「人際網絡」以及「資訊驅動」參加學運者，會因為「人際網絡」（ $B=0.53, p<.001$ ）以及「資訊驅動」（ $B=0.40, p<.001$ ）因素的增加，而增加參與的程度。

至於在控制變數方面，政治功效意識愈強，參與太陽花學運程度愈高（ $B=0.19, p<.05$ ）；就讀「私立一般」大學的大四學生，比起就讀「私立技職」學校的大四學生，參與太陽花學運程度愈低（ $B=-1.03, p<.01$ ）；就讀「農科」的大四學生，比起就讀「法律」的大四學生，參與太陽花學運程度愈高（ $B=4.22, p<.05$ ）。至於控制變數中的其他因素都與學運參與程度都無顯著相關，包括：性別、省籍、家庭社經地位、修習政治相關課程學分數、政黨認同、統獨立場以及族群意識，說明了人際網絡和資訊驅動才是大四學生參與學運的重要原因，但並不會因為使用臉書使用而增加參與程度，亦即不會因為使用臉書而讓參與程度從「很少」到「有時」、從「很少」到「經常」，或從「有時」到「經常」。

表 4：太陽花學運「參與程度」ordered logit（僅含參加學運的大四學生）

	模型二：參與程度	
	B	SE
參與原因		
結構與網絡（6-24）	-0.06	.264
人際網絡（0-4）	0.53**	.170
資訊驅動（0-6）	0.40***	.096
男性（對照：女性）	0.20	.269
省籍（對照：本省閩南人）		
本省客家人	-0.32	.442
大陸各省市人	-0.46	.442
家庭社經地位（對照：低）		
高	0.01	.405
中	-0.05	.323
修習政治相關課程學分數（0-36）	-0.01	.035
政黨認同（對照：泛藍）		
泛綠	-0.03	.418
中立	0.13	.383
統獨立場（對照：統一）		
獨立	0.43	.597
維持現狀	0.28	.595
族群意識（對照：中國人）		
臺灣人	-1.20	2.047
都是	-1.64	2.084
政治功效意識（3-12）	0.19*	.073
學校屬性（對照：私立技職）		
公立一般	-0.42	.347
私立一般	-1.03**	.373
公立技職	-0.81	.735
師範	-1.04	.682
學系屬性（對照：法律）		
教育	1.49	1.322
人文藝術	1.95	1.005
經社心理	1.88	1.003
商學管理	1.08	1.002
理科	0.74	1.050
醫科	1.25	1.188
工科	0.97	1.041
農科	4.22*	1.679
第一截點	2.02	2.415
第二截點	4.87*	2.425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說明一：依變數為順序尺度，從低到高分別為很少、有時和經常。

說明二：樣本數=296；Cox & Snell $R^2=.218$ ；df=28； $\chi^2=72.678$ ； $p<.001$

說明三： $p<.001$, **: $p<.01$, *: $p<.05$

學運中的線上參與導致線下參與政治運動嗎？針對學運的資訊按讚、在臉書上發表（包括主動發表、回文、分享）學運的動態、將臉書大頭貼改為支持或反對學運相關的圖片、對臉書上太陽花學運的相關活動邀請「按參加」都在在展現臉書作為「自媒體」的與眾不同，亦即每個個體都有設定議題的功能，每個個體都可以決定是否為太陽花學運按讚、是否發表、回覆或分享相關內容，甚至決定是否讓他人看到自己的大頭貼改為支持或反對學運，以及自己可以決定是否對太陽花學運的相關活動邀請「按參加」，是否按參加的資訊也公開在受邀他者眼前，成為他者是否按參加的參考，以上都顯現臉書有別於傳統報紙或電視為大眾設定議題的特質。

臉書作為網路媒體，也有別於其他網路媒體，包括部落格、PTT、論壇等，因為它的分享速度更快，即使 PTT 的分享功能也常見，然臉書對使用者而言介面更方面，完全以滑鼠操作，不需要以鍵盤指令操作，是更容易上手的介面。

本研究進一步排除「未參與」的樣本，僅分析「參與」的樣本。研究植基於過去文獻的三大因素與太陽花學運此一政治參與的關聯，其中臉書使用是一種「結構與網絡」因素，還包括「人際網絡」因素和「資訊驅動」因素。研究發現，「臉書使用」僅與大四學生「是否」參與學運有關，當我們研究「參與」的學生時，「人際網絡」因素和「資訊驅動」因素是真正驅動學生增加參與程度的主因。

在本研究的分析中，性別和家庭社經地位與「是否」參與學運有關，可以看出性別政治的存在，過去男性與政治較為接近，女性與政治較為疏遠，在本研究仍有此現象，因為男女在社會化的過程被教育成不同的樣子，女性應該遠離政治。但是當大四學生已經去參與學運，性別就不再與參與「程度」有關。

同樣地，家庭社經地位與「是否」參與有關，卻與參與「程度」無關，可能因為家庭社經地位高者，父母親的教育程度較高，收入或社會地位較高，也間接促成子女藉著上一代的高社經地位關心政治、參與政治。

大四學生學系屬性與「是否」參與太陽花學運的關聯也相當引人注目，在這次學運中，參與的主體可說是法律系的學生，可能與其學科背景有關，法律系的訓練在於追求正義，正是太陽花學運的訴求之一。

柒、結論

太陽花學運在臺灣社會發生了重要的影響，然為什麼發生太陽花學運？研究發現，當大四學生使用社群媒體且因為社群媒體使用影響「是否」參與學運時，這只是一種媒體管道的影響，那麼，真正影響大四學生參與程度的是什麼因素？

如同 Carlisle and Patton (2013)、Miller, Bobkowski, Maliniak, and Rapoport (2015) 所言，網路使用與實際參與可能有落差。我們也看到，大學生只會因為使用臉書而去參與學運，但不會因為使用臉書而讓參與程度從「很少」到「有時」、從「很少」到「經常」，或從「有時」到「經常」。然而，若是因為人際或資訊的驅動，則會提高大學生對太陽花學運的參與程度，但也是一場搭配人際網絡和資訊驅動的學運。

當然，除了臉書，PTT 也是具有動員力量的社群媒體，但本文的目的在研究最多人使用的社群媒體「臉書」的動員效果，因此諸如按讚、粉絲團、將臉書大頭貼改為支持或反對學運相關的圖片，以及對臉書上太陽花學運的相關活動邀請「按參加」，都是針對臉書的設計。本研究除了研究臉書是否動員帶學生參與學運，至於「如何」參與的部分，則可以透過臉書使用的測量，包括：「瀏覽」、「按讚」、「發表」、「分享」、「加入粉絲團」、「更改大頭貼」以及「接受活動邀請」得到動員。

而為何結構與網絡並非參與「程度」的原因？而人際網絡以及資訊驅動卻是重要原因？可能因為結構與網路因素僅是臉書網路的影響，它會影響的是「是否」，但因為僅是一種網路動員，無法支撐或增加參與的程度，畢竟網路是虛擬的，真正支撐參與程度增加的是非虛擬的人際網絡因素和具體的資訊驅動，畢竟人際網絡拉一個是一個，與虛擬的網路動員不同，臉書上按「活動參加」，與實際到場並不相同。

理論告訴我們結構與網絡、人際網絡以及資訊驅動都會促進政治參與，然當這些因素同時存在時，對政治參與的正向促進並不如同理論，反而效果模糊，這很可能是臉書在這次學運實際參與的消極角色。這給予學術上的理論更多的討論空間，亦即人是會思考的動物，全然的動員並不一定如同預期能夠加強參與的程度，臉書是自由的天地，每個個體有話語權，不被他人設定議題，因此海量的臉書學運資訊呈現在眼前時，這些與學運相關的臉書使用帶來的線下實體參與，也給予實務運作者在操作上更細膩的角度。

調查中未參加太陽花學運者亦高達七成以上，但這不會使本研究因樣本較過少，造成抽樣爭議，也不會缺乏代表性的問題。因為在模型一中，我們研究的是

「參與與否」，所以七成大四學生屬於「否」的部分，仍納入樣本進行分析。再者，模型二僅研究有參與的三成學生，是因為實際參與僅為這三成，仍是有代表性的樣本，它仍是全體樣本的次樣本（subgroup）。

本文測試了臉書的動員與大學生參與太陽花學運之間的關聯，至於前者與後者是否具有因果關係，則需要定群追蹤資料（panel data）做更好的因果檢證，在學運發生的短時間內，實在難以進行定群追蹤的研究設計，但本文分析也確立了臉書與太陽花學運之間的「關聯」。

最後，本文的研究限制在於無法以質性研究方法探討臉書為什麼對太陽花學運產生影響，未來將以此為研究方向。再者，「結構與網絡」的確難以獨立出「人際網絡」以及「資訊驅動」而各自成為三個獨立的自變數，彼此可能相關，因此本研究僅就理論層面將其分開，「結構與網絡」和「人際網絡」在意的是動員的形式，「資訊驅動」著重的則是訊息的內容，實際上三者之間可能會有關係。

本研究調查對象縮限在大四學生，使得本文的外部效度可能降低，但卻因為都是研究大四學生，控制了大四學生的特質（比方說都是即將就業或是大學修業年數相同等），因而提高了內在效度。

至於社群媒體具有分享與串聯、自由與創造、聚合與建構以及標註與傳遞的功能，在本文未能深入討論，也列為未來研究建議，若欲研究相關理論，未來可設計相關題目。

最後，雖近期假新聞的探討頗多，然因學運發生時此類的討論較少，本研究當時沒有處理這個議題。若學運發生於今年，也勢必要有所處理，網路假新聞也勢必會是未來相關研究議題要處理的問題。

參考文獻

- 于艾莉，2014，〈我們在溝通或是取暖？Facebook上的學運觀察〉。數位時代，2014年3月27日，取自<http://www.bnext.com.tw/article/view/id/31582>。2015/11/20。
- 今日導報，2014，〈網路世代「學運 2.0」成形〉。今日導報，2014年3月31日，取自<http://www.herald-today.com/content.php?sn=8059>。2015/11/20。
- 孔令信，2016，〈318 學運帶動的媒體革命—夾腳拖與iPad 網路直播模式的反思〉，《傳播研究與實踐》，6(1): 229-250。
- 王靖興、王德育，2007，〈臺灣民眾的政治參與對其政治功效意識之影響：以 2004 年總統選舉為例〉，《臺灣政治學刊》，第 11 卷第 1 期，頁 69-107。
- 田畠真弓，2015，〈太陽花學運的物質資源籌措機制：社交媒體與社會資本〉，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廿週年所慶學術研討會「學生運動與社會正義」。臺北：中央研究院，5 月 29-30 日。
- 何明修，2015，〈從組織動員到臨機應變：太陽花學生運動的啟示〉，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廿週年所慶學術研討會「學生運動與社會正義」。臺北：中央研究院，5 月 29-30 日。
- 周偉航，2014，〈同學，你可以從太陽花學運中學到什麼？〉。人渣文本，2014 年 4 月 8 日，取自http://ninjiatext.blogspot.tw/2014/04/blog-post_8.html。2015/11/20。
- 林麗雲，2016，〈太陽花運動中臺大新聞所學生在「E 論壇」的實踐〉，《傳播研究與實踐》，6 (1): 251-269。
- 晏山農、羅慧雯、梁秋虹與江昺崙撰述，想想論壇策劃，2015，《這不是太陽花學運：318 運動全記錄》，臺北：允晨文化。
- 張約翰，2014，〈太陽花學運期間新聞媒體臉書專頁觀察〉。財團法人卓越新聞獎基金會，2014 年 5 月 30 日，取自<http://www.feja.org.tw/modules/news007/article.php?storyid=1477>。2015/11/20。
- 教育部統計處，2015，〈各級學校學生數〉。教育部統計處，取自<https://stats.moe.gov.tw/result.aspx?qno=MQA1AA2>。2015/11/20。
- 陳婉琪，2014，〈誰來「學運」？太陽花學運靜坐參與者的基本人口圖象〉。巷仔口社會學，2014 年 6 月 30 日，取自<http://twstreetcorner.org/2014/06/30/chenwanchi-2/>。2015/11/20。
- 陳婉琪、張恒豪與黃樹仁，2016，〈網絡社會運動時代的來臨？太陽花運動參與者的人際連帶與社群媒體因素初探〉，《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28(4): 467-501。
- 陳順孝，2012，〈網路社會動員的繼往開來：反國光石化運動的社會科技基礎和行動策略演化〉，《傳播研究與實踐》，2(1): 19-34。
- 趙鼎新，2007，《社會運動與革命—理論更新和中國經驗》，臺北：巨流。
- 劉嘉薇，2014，〈民眾政黨認同、媒介選擇與紅衫軍政治運動參與〉，《政治學報》，58 期：101-126。

- 蔡佳泓與陳陸輝，2015，〈「中國因素」或是「公民不服從」？從定群追蹤樣本探討太陽花學運之民意〉，《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27(4): 573-603。
- 鄭宇君與陳百齡，2016，〈探索線上公眾即時參與網絡化社運——以臺灣318 運動為例〉，《傳播研究與實踐》，6(1): 117-150。
- 蕭蘋，2014，〈是公民？還是暴民？新媒體的公民政治〉。公視新聞議題中心，2014年3月24日，取自 <http://pnn.pts.org.tw/main/2014/03/24/%E6%98%AF%E5%85%AC%E6%B0%91-%E9%82%84%E6%98%AF%E6%9A%B4%E6%B0%91-%E6%96%B0%E5%AA%92%E9%AB%94%E7%9A%84%E5%85%AC%E6%B0%91%E6%94%BF%E6%B2%BB/>。2015/11/20。(Xiao, Ping, 2014, “Citizen or Mob? Citizen Politics in New Media’s,” Taiwan Public Television on Service Online, March 24. <http://pnn.pts.org.tw/main/2014/03/24/%E6%98%AF%E5%85%AC%E6%B0%91-%E9%82%84%E6%98%AF%E6%9A%B4%E6%B0%91-%E6%96%B0%E5%AA%92%E9%AB%94%E7%9A%84%E5%85%AC%E6%B0%91%E6%94%BF%E6%B2%BB/> [accessed November 20, 2015].)
- Beck, Paul Allen, and M. Kent Jennings. 1991. “Family Traditions, Political Period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Partisan Orientations.” *Journal of Politics* 53(3): 742-63.
- Bennett, Lance and Alexandra Segerberg. 2013. *The Logic of Connective Action: Digital Media and the Personalization of Contentious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onifácio, Robert, and Rafael Paulino. 2015. “Corruption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the Americas and the Caribbean.” *Brazili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2): 54-80.
- Boyd, Danah. 2014. *It’s Complicated: The Social Lives of Networked Teen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Boyle, M. P., and M. Schmierbach. 2009. “Media Use and Protest: The Role of Mainstream and Alternative Media Use in Predicting Traditional and Protest Participation.”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57(1): 1-17.
- Breuer, Anita, Todd Landman, and Dorothea Farquhar. 2012. “Social Media and Protest Mobilization: Evidence from the Tunisian Revolution,” Presented at the 4th European Communication Conference for the Europe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Education Association (ECREA), Istanbul.
- Campante, Filipe R., and Davin Chor. 2012. “Schooling,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the Economy,”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94(4): 841-859.
- Carlisle, Juliet E. and Robert C. Patton. 2013. “Is Social Media Changing How We Understand Political Engagement? An Analysis of Facebook and the 2008 Presidential Election.”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66(4): 883-895.

- Castells, Manuel. 2012. *Networks of Outrage and Hope: Social Movements in the Internet Age*. Cambridge, U.K.; Malden, Mass.: Polity.
- Conway, M. M. 1985.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D.C.: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 Creighton, James L. 2005. *The Public Participation Handbook: Making Better Decisions through Citizen Involvement*.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 della Porta, Donatella and Mario Diani. 2006. *Social Movements: An Introduction*. Malden, Mass.: Blackwell Publishing.
- Ekman, Joakim. 2013. "Schools, Democratic Socialization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Political Activity and Passivity among Swedish Youths,"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Education* 1: 1-11.
- Espinal, Rosario, and Shanyang Zhao. 2015. "Gender Gaps in Civic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Latin America." *Latin American Politics and Society* 57(1): 123-138.
- Harlow, Summer. 2011. "Social Media and Social Movements: Facebook and an Online Guatemalan Justice Movement that Moved Offline." *New Media & Society* 14(2): 225-243.
- Jennings, M. Kent. 1987. "Residues of a Movement: the Aging of the American Protest Genera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1(2): 367-382.
- Kaase, Max, and Alan Marsh. 1979. "Political Action: a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pp. 27-56 in Samuel H. Barnes and Max Kaase (eds.), *Political Action: Mass Participation in Five Western Democracies*. Beverly Hills, Calif.: Sage Publications.
- Karp, Jeffrey A. and Susan A. Banducci. 2008. "Political Efficacy and Participation in Twenty-Seven Democracies: How Electoral Systems Shape Political Behaviour."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8(2): 311-334.
- Li, Y., and D. Marsh. 2008. "New Forms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Searching for Expert Citizens and Everyday Makers."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8(2): 247-272.
- Losifidis, Petros, and Mark Wheeler. 2017. "The Public Sphere and Network Democracy: Social Movement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Political Science: The Science of Politics*, ed. Sudha Menon. New York: Delve Publishing LLC.
- Margetts, Helen, Peter John, Tobias Escher and Stéphane Reissfelder. 2011. "Social Information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on the Internet: an Experiment." *Europe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3(3): 321-344.
- Mercea, Dan. 2013. "Probing the Implications of Facebook Use for the Organizational Form of Social Movement Organizations."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 Society* 6: 1306-1327.
- Milbrath, Lester W. and M. L. Goel. 1977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How and Why Do People Get Involved in Politics?* 2nd edition. Chicago: Rand McNally.
- Miller, Patrick R., Piotr S. Bobkowski, Daniel Maliniak and Ronald B. Rapoport. 2015. "Talking Politics on Facebook: Network Centrality and Political Discussion Practices in Social Media."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68(2): 377-391.
- Niemi, Richard G. and M. Kent Jennings. 1991. "Issues and Inheritance in the Formation of Party Identific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5(4): 971-988.
- Nwoye, K. O., and G. O. Okafor. 2014. "New Media and Political Mobilization in Africa: The Nigerian Experienc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2(2): 36-42.
- Obar, Jonathan A., Paul Zube, and Clifford Lampe. 2012. "Advocacy 2.0: An Analysis of How Advocacy Groups in the United States Perceive and Use Social Media as Tools for Facilitating Civic Engagement and Collective Action." *Journal of Information Policy* 2: 1-25.
- Oser, Jennifer, Marc Hooghe, and Sofie Marien. 2013. "Is Online Participation Distinct from Offline Participation? A Latent Class Analysis of Participation Types and Their Stratification."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66(1): 91-101.
- Rosenstone, Steven, and John Mark Hansen. 1993. *Mobilization, Participation, and Democracy in America*. New York: Macmillan.
- Rucht, Dieter. 2007. "The Spread of Protest Politics." pp. 708-723 in Russell J. Dalton and Hans-Dieter Klingemann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Behavior*. Oxford, U.K.;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chlozman, Kay Lehman, Sidney Verba, and Henry E. Brady. 2010. "Weapon of the Strong? Participatory Inequality and the Internet."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8: 487-509.
- Shah, Dhavan V., Nojin Kwak, and Lance Holbert. 2001. "Connecting and Disconnecting with Civic Life: Patterns of Internet Use and the Production of Social Capital."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18: 141-162.
- Snow, David A., Donatella della Porta, Bert Klandermans and Doug McAdam. 2013. eds. *The Wiley Blackwell Encyclopedia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Movements*.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 Stoker, Laura, and M. Kent Jennings. 1995. "Life-Cycle Transitions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The Case of Marriag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9(2): 421-433.
- Tarrow, Sidney G. 1994. *Power in Movement: Social Movements, Collective Action*

- and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Valenzuela, Sebastián, Yonghwan Kim, and Homero Gil de Zúñiga. 2012. "Social Networks that Matter: Exploring the Role of Political Discussion for Onlin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24(2): 163-184.
- Verba, Sidney, Norman H. Nie, Jae-on Kim. 1978. *Participation and Political Equality: a Seven-nation Comparison*.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 Vesnic-Alujevic, Lucia. 2012.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Web 2.0 in Europe: A Case Study of Facebook." *Public Relations Review* 38: 466-470.
- Weber, Christopher. 2013. "Emotions, Campaigns,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66(2): 414-428.
- Yang, Kaifeng and Erik Bergrud. 2008. *Civic Engagement in a Network Society*. Charlotte, N.C.: IAP, Information Age Pub.

附錄：變數重新編碼表

依變數 名稱	問卷題目	重新編碼方式
模型一 太陽花 學運 「參與 與否」	去太陽花學運的現場 ³ 呢？ ⁴	無：從不 有：很少、有時、經常 遺漏值：漏填、拒答、看情形、無意見、不知道
模型二 太陽花 學運 「參與 程度」	去太陽花學運的現場呢？	(02) 很少 (03) 有時 (04) 經常 ※分數愈高，參與程度愈高。 遺漏值：漏填、拒答、看情形、無意見、不知道
自變數 名稱	問卷題目	重新編碼方式

³ 「現場」指立法院周圍，不一定要進入立法院。

⁴ 若有大學生在學運前已訂閱某傳統媒體粉絲團，在學運期間透過這個粉絲團「滑」到學運資訊，也會算成臉書使用。再者，大學生的舊識在臉書上是臉友，此時互通的資訊在本文界定為「臉書使用」，不會界定為單純人與人實體互動的「人際網絡」。

模型一 稱之： 與學運 相關的 臉書使用 (簡稱：臉 書 使用) 模型二 稱之： 結構與 網絡	1・請問您去年有沒有在臉書上 瀏覽學運的資訊？ 2・請問您去年有沒有在臉書上 針對學運的資訊按讚？ 3・在臉書上發表(包括主動發 表、回文、分享)學運的動 態呢？ 4・在臉書上加入支持或反對學 運相關的粉絲團呢？ 5・將臉書大頭貼改為支持或反 對學運相關的圖片呢？ 6・對臉書上太陽花學運的相關 活動邀請「按參加」呢？	(01) 從不 (02) 很少 (03) 有時⁵ (04) 經常 將六題加總，最低分 6 分，最高分 24 分。 遺漏值：漏填、拒答、看情形、
參與 原因	請問您去現場最主要的原因是 什麼？(可複選)	本題為複選題，可視為參與原因多題 的集合，亦即每一題皆為選項為 「有」、「無」的題目。本研究依照理 論將所有選項(亦即題目的概念)分 為三個構面，分別如下：⁶ 1.結構與網絡：如上模型一的自變數 「與學運相關的臉書使用(簡稱：臉 書使用)」 2.人際網絡 (04) 因為同儕邀請 (05) 因為老師鼓勵 (06) 因為老師將課程帶到學運現場 上課 (07) 因為父母鼓勵 3.資訊驅動(因知識、議題、施政表 現等理性因素) (08) 因為想增加對於學運的瞭解

⁵ 「很少」去學運現場以及「有時」去學運現場的認定由受訪者認定，非客觀的次數。

⁶ 以下幾個因素因為人數低於 1.2%，暫不分析：這是一種潮流，需要共襄盛舉，以及「其他」選項：反對簽署不平等的條約、因為 PTT 上的討論、反對臺灣社會福利被大陸剝奪、家人同行、反對服貿內某些條文、路過。

		(10) 反對經貿自由化 (11) 反對與中國大陸有更緊密的經貿交流 (12) 反對黑箱程序 (13) 反對馬英九總統領導的政府 (14) 不滿政府處理學運的方法 遺漏值：漏填、拒答、看情形、無意見、不知道
控制變數名稱	問卷題目	重新編碼方式
性別	訪員自行勾選	(1) 女性（模型分析時為對照組） (2) 男性
省籍	請問您的父親是本省客家人、本省閩南（河洛）人、大陸各省市人，還是原住民？	(1) 本省客家人 (2) 本省閩南人（模型分析時為對照組） (3) 大陸各省市人 遺漏值：原住民、僑民、外籍人數、漏填、拒答、不知道
家庭社經地位	以您所瞭解的臺灣社會狀況，請問您認為您家庭的社會經濟地位是屬於哪一個階層？	(1) 低：下層、中下 (2) 中：中等 (3) 高：中上、上層 遺漏值：漏填、拒答、看情形、無意見、不知道
修習政治相關課程學分數	您在大四這一學年有沒有修習或旁聽下列的課程？（請將相關課程的總學分數填寫在空格中，如果都沒有修習或旁聽該項課程，請填上“0”學分） 憲法相關課程，共_____學分 政治學相關課程（含公共行政、國際關係、公民文化...等），共_____學分 兩岸關係相關課程，共_____學分	遺漏值：漏填、不知道
政黨	我們社會上有人說 he 自己是「支	(1) 泛藍：國民黨、新黨、親民黨

認同	持國民黨的」，有人說他是「支持民進黨的」，也有人說他是「支持親民黨的」，也有人說他是「支持臺聯的」。請問您認為自己是「支持國民黨的」、「支持民進黨的」、「支持親民黨的」、「支持臺聯的」，還是支持其他政黨？ 若回答「國民黨」、「民進黨」、「親民黨」或「臺聯」，則將其政黨屬性依照右方原則歸為泛藍或泛綠，若非回答上述政黨者，則續問下題，同樣依照右方原則歸類。 請問您比較偏向國民黨、偏向民進黨、偏向親民黨、偏向臺聯，或是都不偏？	(模型分析時為對照組) (2) 泛綠：民進黨、臺聯 (3) 中立：都不支持、看情況 遺漏值：漏填、拒答、無意見、不知道
統獨立場	關於臺灣和大陸的關係，有下面幾種不同的看法，請問您比較偏向哪一種？	(1) 統一：儘快統一、維持現狀，以後走向統一(模型分析時為對照組) (2) 獨立：儘快宣佈獨立、維持現狀，以後走向獨立 (3) 維持現狀：維持現狀，看情形再決定獨立或統一、永遠維持現狀 遺漏值：漏填、拒答、看情形、無意見、不知道
族群意識	在我們社會上，有人說自己是「臺灣人」，也有人說自己是「中國人」，也有人說都是。請問您認為自己是「臺灣人」、「中國人」，或者都是？	(1) 臺灣人 (2) 都是 (3) 中國人(模型分析時為對照組) 遺漏值：漏填、拒答、看情形、無意見、不知道
政治功效意識	像我這樣的人的看法，政府官員是不會關心的。 像我這樣的人，是很難了解政治的事情。	(1) 非常不同意 (2) 不太同意 (3) 有點同意 (4) 非常同意

	像我這樣的普通老百姓，對政府的政策是沒有什麼影響力的。	三題選項皆需轉向處理，符合分數愈高，政治功效意識愈高。
學校屬性	訪員自行填寫，研究單位歸類。	(1) 公立一般 (2) 私立一般 (3) 公立技職 (4) 私立技職（模型分析時為對照組） (5) 師範
學系屬性	訪員自行填寫，研究單位歸類。	(1) 教育 (2) 人文藝術 (3) 經社心理 (4) 商學管理 (5) 法律（模型分析時為對照組） (6) 理科 (7) 醫科 (8) 工科 (9) 農科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From Online to Offline: University Students' Participation in Sunflower Student Movement

Jia-wei Liu *

Abstract

Sunflower student movement was the biggest movement that influences society and state very much, but it was also a good opportunity to review the practice of democracy in our country. Different from the past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the power of Facebook was discussed very often in this movement. This study found that Facebook affected university students to participate the movement or not. However, interpersonal factors and rational factors really affected the degree of participation.

Keywords: student movement, sunflower student movement, Facebook, internet,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Policy,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E-mail: jwliu@mail.ntpu.edu.tw
Received: 2020/01/03 Accepted: 2020/03/14